

B222.45/68

邵耀成 著

孔子這個人與他所面對的問題

丁巳夏月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邵耀成 著

孔子這個人與他所面對的問題

訂 吳 齊 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 / 邵耀成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04-7546-0

I. 孔… II. 邵… III. 孔丘 (前 551 ~ 前 479) - 生平事迹 IV. B22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0651 号

责任编辑 冯广裕

责任校对 马 谷

版式设计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3

字 数 351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与邵耀成先生相识是在1980年周策纵教授主持，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系召开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那是中国重新开启面对世界的门户之后，文史界第一次派红学界的代表参加美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大陆是周汝昌、冯其庸和我一行三人前往与会。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海外一些著名学者都来了，真是胜友纷至，冠盖云集，屈指算来已阅二十八年矣。当时我方逾知非之年，而邵先生少年清彦，方执贄于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门下。与邵先生会上攀谈，始知邵先生已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数学学位，由于对文史的浓厚兴趣，又转到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攻读，我当时就对邵先生满怀敬意。我想如果不是至情至性，追求真学问之人，断不会作此“不顾实际”的选择。会上一别，很少和邵先生再晤，曾受他远道之托，转交给钱锺书教授一篇他的文章，钱先生回信，对之颇为称许，以治学当掉臂向前一语相勉。以后从其他朋友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消息。听说 he 已从刘先生门下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作的是《文心雕龙》。后来又听说他在美国改行，下海经商，在华盛顿创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当时心里不免觉得惋惜，以邵先生的天分令才，加上他自己对文史的兴趣和扎实的根基，如能长在庠序间，必也能开辟自己的一方沃土，令世人瞩目。他忽而弃学从商，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去年夏天，一个晴朗的下午，邵先生忽然来访，别后垂三十年，老友重逢，分外亲切，握手之际，想起当年红学会上的情景，宛在目前，然相对华发，不免又生出几分感慨。互道寒温之后，邵先生又拿出了厚厚的一叠稿子，题目是《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这一次又大大地出乎了我的

意料。没想到这么多年商海濯足之余，邵先生又拿出了那么丰硕的研究成果。仔细拜读了邵先生著作之后，更多了几分感慨。现代人多喜欢说所谓“儒商”“儒商”，张口闭口不是陶朱、猗顿，就是胡雪岩、乔致庸，实际上所推崇的不在“儒”而在“商”字，但我更欣赏的是“商儒”，能在商界里打滚的同时，又能不忘情于追求知识，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这样的人物，诚不多见，邵先生庶几乎是矣！

《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如作者所说，是“尝试把孔子放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位置上，来看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社会问题”。我们知道，孔子的一生既精彩，又是扑朔迷离，古往今来，随着人代迁移，孔子也由一个“乡里教人以道义”的师儒，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历代粉饰和神化的过程，自然是把一个凡人不断地超凡入圣。科举考试在元仁宗以后成为定制，孔子形象的神圣与庄严，更是任何人不能质疑的。记得明初解缙参加乡试时为“子曰”一句话破题时，曾袭用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的两句话：“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前一句点破了“子”字，标举了孔子在历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后半则点破“曰”字，说明了孔子的话如何有着垂教万世的分量，有着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分量，他老人家想自甘凡俗，想不被神化已不可能。

正因为如此，关于孔子的著作，无虑汗牛充栋。远则如司马迁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王肃的《孔子家语》，近则如钱宾四的《孔子传》，匡亚明的《孔子评传》，再近的如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对孔子的生活、思想、经历和时代，我们似乎不乏资料 and 描述。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对这一论题还有必要更进一步探讨吗？我想看过邵先生这部著作一定会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邵先生此书的特点首先是既有学术性，又有相当的可读性。这部著作是文散结合，夹叙夹议，加之以幽默的笔法，为我们揭示了孔子作为一个人的凡俗的一面。关于孔子的身世，最为后人隐晦的莫过于说其父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对于后儒来说，最刺眼的莫过于“野合”一词。最重视礼教并且变身为两千年来礼教之祖的孔子，其本人竟然是超越礼法之外的产儿，这真是有些反讽。司马迁凭着一支无所顾忌的史笔，把老夫子与生俱来的疮疤给揭了出来。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后世颇受讥评，与司马迁不为圣人讳恐怕也不无关系。

班固父亲班彪在《史记论》中就说：“其（司马迁）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汉初重黄老而轻儒学，司马迁夫子亦有此倾向，后儒对司马迁所记述“野合”一事及孔子见老子一事多有非议。王肃作《孔子家语》，即说两人原有婚姻，绝口不提野合一事，而孔子入周见老子，王肃所记老子的一番话又与《史记》绝不相同。邵先生追溯了后儒为“野合”曲为饰词的根源：一出于张守节《正义》，一出于司马贞《索隐》。司马贞说所谓“野合”是说“梁纥老而征在少”，而张守节则说男子六十四岁则阳道绝，女子四十九岁则阴道绝，过此年龄成婚皆为“野合”，邵先生就此评语不无幽默：“我们今天社会上众多老夫老妇的黄昏结合，照司马贞和张守节看法，就是‘双料野合’，他们两位在唐代就能为我们资讯时代如此解颐妙语，也真是太有幽默感了，但他们这个妙解大约是找不到旁征的。”幽默中则又一语破的。其后，作者又从《周礼·地官司徒·媒氏》所记“中春之月，令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周代婚俗来论证“野合”实为当时的旧俗。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砖“桑林野合图”又从另一侧面证实了周代“野合”风俗的可能性。

本书的又一特点是翔实的历史背景的考核。在论述孔门弟子何以多仕于卫时，邵先生对卫鲁政治的不同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卫鲁政治最大的不同在于卫君有君权而鲁君已大权旁落，政权落在执政的贵族手上。”而手握君权的君主多喜任用贤人，其中不乏异姓平民。而孔门弟子既多仕于卫，复多仕于鲁，前者是因卫君任用异姓平民，后者是与孔子“我们这位沉默的革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鲁国不任用平民异姓的传统”相关。邵先生的这段分析可谓独具只眼。考察历史背景，我们现在所能而所必须依据的不仅是历史文献中的资料，而且还要面对出土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这也是由于学术的长足发展所致，特别是有关商周的文化 and 历史。古代学者要寻绎古史的旧观，曾过度相信传说记载，举凡经、史、疏、注，子部百家，都以为信史。关于孔子的生平、交游、仕履、行状，也不免掺杂了一些当时的神话和后世的想象。清人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其用意固然是把经典还原成了历史文献，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经典代表了绝对的真理，而是认为另外有真理，经典和其他文献一样是可资参照的以规事理（刘咸忻语）的文献。清代学者“取证乎六经”，至于也有人笃守经典，甚或以为“六经以外无信史”，则是

一种偏嗜文献的取向。清代晚期金石学大兴，实为考古学之萌芽，发展至所谓罗王之学，史家又有不信经典，由“六经皆史”一变而至“金石以外无史”，形成偏嗜文物的史学趋向。时至今日，考信三代，二者不可偏废，已是达人共识。本书论孔子之生平、仕履、出游及其门人，既多取信于六经，复多征用古史考古的成果，视界阔阔，言必有据，虽然语言通俗，面向大众，然绝非坊下流行之通俗文学本可比。如讲到鲁国贵族和孔子的畋猎，孔子的婚姻，鲁国保存的典章礼乐，作者虽出之以大白话，实际上乃结合了目前考古研究、历史研究对周代文化的理解，也包涵了作者对相关成果的认知。

邵先生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得到数学硕士学位，他在介绍孔子生活的背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时，谈到伏羲八卦在中华文化发展上的重要。在这里，作者又一次显示了其数学家独到的眼光，如他指出天地人爻位的意义在于揭示了数位在数学上的重要性。在很多问题上，邵先生都有自己的见解，难以一一列举。我认为最能让读者一新耳目的应该是书中对孔子思想的分析。在谈到孔子的思想时，作者分列了几个标题，如：“以礼的眼睛看世界”，“以形容和分析的方法对‘仁’作概念性的探讨”，以及“构成文明的焦虑不安的父系社会与婚礼的关系”。这些篇章在在显示了作者作为数学家所独有的逻辑语言的魅力。在谈到中国传统中以“礼”的眼睛看世界时，邵先生以此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作了有趣的比较，认为与中国不同的是，希腊是以“神话”的眼睛看世界。并且指出：“有一部分学者甚至认为仪礼与神话，在古史中是有‘同步而行的’（*pari passu*）的源头，与互为印证的结构与气氛。也就是说……礼是一般性（*general*）的，神话是个体性（*individual*）的。礼是一节一节（*episodic*）按时间顺序的，神话是有情节结构（*plot structure*）的。礼的节与节之间的关联是节奏呼应性（*echoing*）的，神话的事与事之间的关联是因果呼应性（*casual*）的。礼的重点在外观的行为（*external behavior*），而神话的重点在内在的冲突与和解（*internal conflict and resolution*）。希腊用‘神话的眼球’看世界，中国人用‘礼的眼球’看世界。”

读邵先生这段话不觉为之击节，中国与希腊在古文化的特征上当然有很多异同之处，但邵先生的这段分析是用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中结构主义的方法，借以反观中国的文化，揭示了很多我们未曾看到，或者说看到了也未

曾予以足够重视的特点，像这样的论述书稿中还有很多。

综观全书，不乏精义，可以说这是一部可读的好书。我以为邵先生实得益于其所受到的严格科学训练，他的业师刘若愚教授所给予的西方文论的训练，以及他自己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挥独立思考，更进一步。我希望他再接再厉，我们未来能读到更多邵先生的著作，获取更多新鲜的知识和对人生及历史的领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陈毓罴

目 录

前言	(1)
目标	(1)
体例	(6)
鸣谢	(7)
一 时代背景	(8)
春秋末年的政治混乱与经济繁荣	(8)
鲁国的历史、政治与文化	(10)
二 孔子生平	(21)
孔子简历	(21)
孔子与其年代——评论式的详细年表	(27)
三 孔门弟子	(112)
孔门重要弟子介绍	(112)
孔门弟子年份、出身、籍贯、仕途分析表格	(138)
孔门的教学课程与教育方式	(148)
六艺的教学材料与工具、兼论弟子的出身与出路	(152)
四 孔子所承传的文化与思想	(159)
一个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以“礼”的眼睛看世界	(159)
婚礼与以之而来的父系社会所构成的“文明的焦虑不安”	(165)
论《道德经》中母系社会的价值观	(169)
论伏羲八卦与文王易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	(175)
从缺乏神话到《易》卦变化程序的探讨	(181)

五 孔子的思想	(189)
以形容与分析的方法对“仁”作概念性的探讨	(189)
以形容与分析的方法对“礼”作概念性的探讨	(210)
孔子的伦理美学观——礼乐作为美的观赏对象	(219)
从“天生我德/斯文”看孔子的“天命观”	(222)
从“自我价值观”看君子	(230)
附录	(234)
一 论孔父孔母的野合与孔母的家世	(234)
二 孔子不知其父与不知其父墓之辩	(239)
三 孔子周游十四年中的时间坐标	(241)
四 孔子的先世的介绍	(245)
五 孔子在六艺中射御数的成就	(248)
六 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孔子问礼于藏室史	(254)
七 青少年孔子佃猎之乐的构思	(257)
八 孔子时的雅言	(259)
九 孔子的衣食住行	(261)
十 有新兴国味道的卫国与以郊礼迎孔子的卫灵公	(263)
十一 弑君年表、简论春秋的特色与孔子言责的履行	(266)
十二 论孔子晚年的忙碌与胜利	(268)
十三 书中重要人物介绍	(271)
十四 本书中出现过的重要人名	(283)
十五 本书中出现过的重要地名	(295)
十六 本书中的《论语》引文	(300)
参考书目	(315)
索引	(323)
后记	(346)

前言

目 标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引发起大家对孔子以及他的时代作进一步的讨论，特别是二千五百年前，在衣食住行与教育上，中国人是怎样生活的。中国人不喜欢以石结构起房子，因此不像埃及、希腊与罗马，留下石柱支撑起来的崇楼伟宇，让后人能更准确地领会中国高堂飞檐的风格，甚至连砖墙瓦顶的结构也没有给后人留下来，弄得我们不敢说：春秋时一定有砖瓦结构的建筑。布料方面，《诗经》中有种类繁多的记载，在考古文物中也有丝麻等纺织品的发现。在衣服的式样方面，因为缺乏壁画雕塑与实物，我们的知识相当空白，大约春秋人穿袍、穿裙，但还未穿裤。孔子寿星公那样的打扮，恐怕并没有真正反映春秋时代人的穿戴。孔子非常注重食物的卫生，但那时的人如何保持鱼肉的鲜美，我们也茫然^①。甚至我们不能确知：孔子用箸是当大牙签那样用来叉食物的，还是像后来的筷子那样用来

^① 《左传》从桓公十四年（前672）到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孔子36岁）——大约150年间，共有19次有关冰的记载。其中七八处与饮食中冰块无关，与饮食有关的有两个年份的记载，一是昭公四年（孔子13岁时），其中有“奉壶饮冰”，一是昭公十三年（孔子22岁时），特别是后者有很详细的记载关于什么时候天地制冰，什么时候人们应该藏冰，冰在朝廷的分派，谁有资格领取冰块，冰的各种用途等。例如，“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当冰从冷藏库中拿出来，凡是有禄位的官员，在迎宾、膳食、丧礼、祭祀时，都可取来应用〕”。又说，“食肉之禄，冰皆与焉〔凡是有禄位，且能分派得祭肉的官员，都能用冰〕”。所以孔子五十岁以后也是有资格享用到冰的。又《诗经·七月》的最后一章，就是说到藏冰的方法。因此孔子时，中国人已知道利用冰来保鲜。《大学》中有“伐冰之家”一语，即指卿大夫之家。因此，冰大约是上层阶级才能拥有的东西。平民百姓是如何保鲜的，还有待我们专家学者考定。《论语》记载不吃宿肉的孔子“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10.7》〕。那么，祭肉是因为某种方法而可以保鲜三天的，我们认为某种方法就是冰。

夹食物的呢^①？我们有春秋时代与之前的车驾，但我们不清楚那时路途的情况，是猛兽横行“如虎如兕”的呢？还是原野清平不见吃人的野兽呢？若果孟子没有骗我们的话，那么、应该是后者^①。我们知道孔子传授六艺，但我们对六艺的内容，概念含糊，马虎不求甚解。我们邀请大家来讨论探索，增进彼此间在这方面的知识。希望有一天我们能还原古人，包括孔子及其生活的实况。

孔子（前 551—前 479）是一个面色苍白得没有血性的人吗？这是他被神化后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被认为有“冬烘”味道的圣人，但我们相信他不是。他少年时“贫且贱”^②，饱尝世情的冷暖，对人性炎凉的本质有极深刻的认识。长大过程中，受过整套贵族六艺教育的培训，他对历史与时政的黑暗有了如指掌的认识，他对世途与人性的险恶是完全知道的。他相信他那套贤人礼教政治可以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不是因为他对人性有天真的幻想，而是基于他对人性的“性相近、习相远”^③的观察，认为好的教化与合乎礼仪的社会结构能提升人在利己中也不忘记要利他人；人性在好的一面有它的可塑性，这个善的可塑性乃和谐社会的基础。他为此看法或理想的实现，付出了他可以安享晚福的十四年。我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孔子是一个倒霉鬼，在穷途末路下周游列国求官做。事实上，他在四五十岁时已名满鲁国，桃李盈门，权臣有重要事都向他讨教；要人才时，请他推荐；他的两个弟子冉有（约前 522 生，死年不详，死于孔子之后）与子路（前 542—前 480）成为宰相季氏左右手的部长/副部长级官员；他自己也是部长级〔每年“奉粟六万”斗〕的司寇大夫^④，可能有名位而无

① 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有像今天筷子那样的小棍子，是用骨制造的，头尖，似乎是用来叉食物的大牙签那样的用具——人类以木条叉食的本能可能来自人猿，因为黑猩猩就有以树枝叉食树杆夹缝中白蚁的举动——问题在于：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古人用一对小棍子来夹食物，而不是以之来叉食物的呢？我们的古人能灵活的像现代人那样用筷子，这恐怕是一个上千年的进化，正如人类学习走路学习了几十万年。云南的祥云大波那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铜箸，很像筷子。我们往往都说那是由中原传去边区的，但为什么不可以是从云南传给中原的呢？特别是是用筷子的技术，那一定是一个人在灵感突发的一刹那所发明的。见刘云等编：《中国箸文化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版，第 50—69 页，第 498—500 页，并图 7。

① 《孟子·滕文公下》载：“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② 《史记·世家》：“孔子贫且贱。”

③ 原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

④ 《史记·世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实权^①；不能推行他建立和谐社会的理想。例如，国家朝会议事有时只请冉有而不请他^②。他如果不“争一口气”，不说统治者不爱听的话，安心做他社会的贤达，那他日子是很好过的。不独他不用怕“彼妇〔齐国女乐〕之谒，可以死败”^③；还可以经常与鲁君一起观赏齐女的文衣妙舞。但他志不在此，他选择了吃不好睡不好颠散骨骼的石子路。孔子不奢侈，但在衣食上相当讲究，做他太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曾经照顾过他的三个女性〔他太太、他女儿、他侄女〕都不在他身边。只好靠曾经做过大官的子路照顾他的衣食住行。子路为他熬过药，求过神，也要不信神的孔子为自己祈福^④，孔子唯唯诺诺。就是不肯回鲁国养病。孔子六十多岁的一个春天，在山野间，看到锦绣般的山雉，叹说：“时哉！时哉！”^⑤ 我们不知道他是在感叹：“又一个春天！”还是在说：“是回去的时候了！”不过，子路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夫子想吃山雉。打了山雉，教下人按师母炖野山雉的做法给孔子炖好，孔子吃了三口，就吃不下去。

要以平常心来看孔子这个经过二千四百年神化，又经过近一百年丑化的人物，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尝试把孔子放在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的位置上，来看他所生活的社会，他所面对的时代和社会问题。分析：滋养他生长的特殊历史与文化的开拓性与局限性。他好古、他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热忱来信古，他自诩自己对古礼的知识（对他来说，那是文化最高峰的表现）有追源溯流的本领^⑥。他对学问与人格的追求是动态的，用一个非常形象

① 请参见本书第二章孔子生平年表50岁中关于“直升机式的官运”的讨论（第79页）。

② 《论语》原文：“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13.14〕我们认为孔子在周游列国前，冉子已为季氏做事，因为他的表现，才会在492年召他回鲁任季氏宰。

③ 我们认为孔子离鲁出走，是软性地被迫的，以不给祭肉来表示统治者因为堕三都的事要摘去他大夫的官职。孔子不愿被拿去官职，降低他的社会地位而出走的。也因此不愿在没有“以币召之”（见《左传·哀公十一年》）的情况下回鲁，虽然在出走五年之后（前492），就极想回鲁。请见本书第二章孔子生平年表60岁中的康子召冉有条（第97页）。

④ 原文：“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谏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7.35〕

⑤ 原文：“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10.25〕我们把这段话放在这一时段，是猜想，这段话的确切时段，待考。

⑥ 原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9〕

化的比喻，乃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用学与思二条腿、一步步跨着走^①，直到人生的尽头，才知道自己的成绩^②。在他自己生命到达尽头的时候，他对道德准则的认知与相应的内在感情和外在行为达到了一致性与完整性。所谓：“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2.4》]。这是他自己道德行为的总结。孔子在自己长大成人的曲阜度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七十二（阳历）或七十三（阴历）个年头^③。在公元前479年（阴历己丑年四月）一代哲人逝世。

一直到清末，人均寿命都还低于五十岁，相对而言，孔子可以算是高寿了。在经过十四年颠簸后回到家乡的最后五年中，孔子三次白发人送黑发人^④：儿子孔鲤（前534—前484）、学生颜回（前521—前481）和子路。前二人是自然死亡；子路乃是在刀来剑往中横死过去，临死前还要绑好冠帽不让它掉到地上。这是子路所记得的夫子礼教。

难道这样的礼教思想与教育就让孔子登上中国文化人中第一把交椅吗？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孔子塑造了中国的文明，那是事实。作为现代人，我们反省这个文明与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从而摸索我们自己文明的方向。在《论语》（成书约在孔子死后一百年间，前479—前379）中，孔子说他曾经“不食不饮”，思索他人生与文化的道路。得不出结果，他又重新回去学习前人的文化成果^⑤。他对他所继承的文化做过怎样的反省呢？他开创出来的文化，在哪方面是创新具有革命性的呢？他不可能纯粹是一个

① 原文：“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2.15》]

② 原文：“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8.7》]

③ 《史记·世家》：“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④ 关于孔鲤，《史记·世家》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孔子家语·本姓解》载：“鱼年五十，先孔子卒。”关于颜回，见《论语》原文：“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11.9》]又有：“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11.10》]《史记·仲尼弟子》载：“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早]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关于子路，《史记·仲尼弟子》载：“于是子路欲燔台，蒧黷惧，乃下石乞、壶廙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纓而死。”《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事实上，还有一个弟子也在前480年卒，那就是司马牛，孔子是否知道他的死，则不明确。

⑤ 《论语》原文：“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15.31》]

传统的继承者^①。

孔子死后一百年间，中国社会有惊天动地的变化；那就是“铁革命”的出现^②。那是一场生产与经济的大革命，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大都会。几万人的都邑膨胀成为三十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而且舞榭歌台笙歌不绝，中国开始有灯火通明的夜生活。从前人口一万不到的县镇，一下子变成有十万人口的中型城市。而且当时有众多这样的城市。城市中有富人，也有穷人；但总的来说，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比乡下人来得好；最重要的乃是，城市人有较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在贵族与农工之间，出现了中产阶级：包括沦为庶人的贵族、庶人中的读书人（又称儒生，意指不会打仗的读书人，有别于能打仗的贵族读书人）、发迹的商人以及有产业的工匠。渐渐地，中产阶级取代贵族成为中央与地方上的行政官。被录用的标准乃是一个人的学问、能力和道德，而不是他的出身。虽然在实践上，往往有偏差。但在主体上，这个理念是被落实的。这是人类史上第一个以贤能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是一个比十大发明更重要的发明。没有孔子，中国不一定会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制度。从传统、社会、与成长，我们编织孔子的梦想，述说一个禀赋有七情六欲“出于其类”的凡人，成长为在行为与思想上“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的文化伟人。这是我们想要说的故事^③。

① 见本书第三章《孔门重要弟子介绍》的序言。文中指出：“孔子弟子出仕为官可谓彬彬之盛，占了鲁国中上级官场的半壁江山。孔子虽然不谈‘向较高阶层流动爬升（upward mobility）’的观念，但我们这位沉默的革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鲁国不任用平民异姓的传统。”并见书中有关仁、礼、天命的文章。

② 中国在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时铁器就开始普遍了（见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鱼易：《东周考古上的一个问题》，《文物》1959年第8期，第64页），有斧、铲、锛等生产工具，以及戈、矛、剑等兵器。到孔子时候大约有加速趋势，开始了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历史进程，且所用器具种类有所增多，车马机具产生，铁器向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见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铁工具的农工商业影响促进城邑的发展（见周一良、邓广铭、唐长孺、李学勤等编：《中国历史通览》，上海：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战国策·赵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③ 追求真实的孔子最近成为大家的意愿，秦安平〔音译〕女士的书作如下：Annping Chin. *The Authentic Confucius: A Life of Thought and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2007, p. 2.

体 例

我们尽量注明每一个人物的年份或年代，包括传奇人物；按惯例，只在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这样做，但也有例外，例如孔门弟子专章里，他们在该章第一次出现时，会重注一次；重要人物介绍附录十三亦同样处理。年份的格式为某人（前 500—前 429），若在公元前一年内，则在后一个年份加“前或后”以示公元前或公元后，例如某人（前 71—前 4）或某人（前 71—后 4），前者死于公元前 4 年，后者则公元后 4 年。地名亦然，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乃近代何处，再出现时请看索引；将提供重要地点间的距离，例如曲阜与洛京的距离等，以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根据。

参考书目请看该篇章前言，在注解中，第一次引用，则附全书资料，再引时，只提供作者与书名，引古籍时，则按常例提供书名与篇章名，例如《礼记·檀弓下》。有三个书目或篇章例外，《论语》只以篇号章号来代表，例如，《10.3》乃乡党第十之第三章，《道德经》只以《63》代表第 63 章，另外《史记·世家》代表《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

引文则亦在第一次时提供，但有时引文的一部分会重现，以方便对文义的了解。《以形容与分析的方法对仁作概念性的探讨》与《以形容与分析的方法对礼作概念性的探讨》二文例外，所有引文都会重引，以求解说完备。

索引为选择性的索引，侧重在五个项目上：人名、地名、书名、引文与文化观念或哲学概念，其他则不予索引；五项中的人名、地名与观念皆有选择性。由于古籍对人的称谓变化良多，例如、称孔子儿子孔鲤为“鲤”、为“伯鱼”、为“鱼”[见《孔子家语·本姓解》，注 77]；《论语 11.17》“季氏富于周公”的周公，大约不是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周公，而是一种暗喻式的用法，意指鲁君。我们文本又称历史上的周公为“老人家”（第 12 页），也用在孔子身上（第 73 页）。另外，少正卯到底是历史人物，还是荀子为了演说一个道理或看法而虚构出来的人物，我们还没有弄明白；因为自庄子说寓言开始，战国哲人就有虚构人物来演绎道理或看法的风气。老子又是人名，又是书名。人名上主观性的选择是一件不可避免之事。

鸣 谢

当我最初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只写一个没有注解的大众版，写了几个章节之后，分送给一些熟人阅读，征求大家的意见，得到很大的支持，特别是我昔日的同学张圣诵女士与她的先生王平东及她的弟弟。我从前的三个学生陈瑞山先生、段晓明先生与辜静宇先生给了我很多提议，这是我所不能忘记的。我的朋友黄剑平先生与张恨水的女儿张明明女士也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也因为写这本书，我与陈毓黻先生、冯其庸先生在经过二十八年后又再重逢，陈先生答应给我写序，冯先生给我题字，弄得气氛蛮热闹的。一到了北京，就二十四小时为这本书忙。写了一半后，送了去一些出版社，看看有没有市场。一个出版社主编常绍民先生提议我先写学术版，再写大众版，得到陈先生、冯先生、余英时先生的支持，我就更手足无措了。除了打字外，原来是一脚踢的，所有资料的收集都是自己动手的；当决定写学术版后，不得不找人帮忙。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代馆长朱迪·卢雪乡女士、已退休的保罗·何栋先生在找中英文书籍方面给我帮助良多，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吴荣桂先生给了我杜维明先生所有著作的书目名单与谈儒家思想的网页，黄璐女士修改了我很多不合现代汉语语法的句子，熊婕女士核对我引文的错误，把注解标准化。汤群凤女士与一位李慧颖女士帮我在网上找资料与打字，后来连熊海静女士和王宏磊先生也加了进来。自然我还得特别谢谢一开始就帮我打字的刘稳小姐，是她与黄璐女士打理我在北京与华府的生意，使我能安心写作。

另外，在一次拜访中，李学勤先生告诉我，春秋时在竹简上刻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陈致先生告诉我仁字在甲骨文中作“夷”释。可谓一事与一字之师，令我受益匪浅。

在联络出版社方面，我要谢谢常小琪女士与陈毓黻夫人；事实上，我应该谢谢余英时夫人与冯其庸夫人对我友善的鼓励。我也要谢谢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广裕先生对我审稿所做出的努力，深为感激。

最后一个，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乃是《美华商报》的总经理翡翠·周佳利女士，在我只写了二三万字的时候就答应给我在她的报纸上连载，直到我决定写学术版而停止，盛情之隆，教人难以忘怀。